



漢

E Guo Hanxueshi

俄国汉学史

阎国栋◎著

卷一

人民出版社

阎国栋◎著

俄国汉学史

俄罗斯汉学自19世纪始。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学者辈出。著作无核。帝俄时期的汉学家有罗蒙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西维洛夫、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王西里、巴拉第、余哈旁、孔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基、孟第、柏百福、贝勒、伊凤阁和屈纳等。

迄于1917年

责任编辑：刘丽华
文字编辑：陶 东
责任校对：书林瀚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国汉学史 (迄于 1917 年) / 阎国栋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ISBN 7-01-005946-2

I. 俄… II. 阎… III. 汉学-历史-俄罗斯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5064 号

俄国汉学史 (迄于 1917 年)

E GUO HAN XUE SHI (QI YU 1917 NIAN)

阎国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3.25

字数：63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946-2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国学、西学与汉学

——《俄国汉学史》序

张国刚

“汉学”与“国学”一个时期以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流行色。前者指海外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后者指国人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只是主体不同而已。有人说前者是从外部看中国，后者是从内部反省自己，不管这种比喻是否确当，无论如何，国学与汉学关系密切，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国学概念的提出原本是相对于西学而言，非因为有了汉学。

国学者，乃中国学术简称也。这是张岱年先生的说法。^①这样的说法就来自五四时代：“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②。当时有《国学季刊》的编纂，嗣后陆续有章太炎、钱穆的《国学概论》的出版。高扬国学的旗帜，作为对于五四及其以后西学汹涌、斯文扫地的一种抗争，自当有其历史意义。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这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宗旨即可知一斑。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说：一

① 此论仍见于张岱年《国学今论》序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国粹学报》第十九期《国学讲习记》。

是“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三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基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且所学与国情隔阂。”可见国学研究的兴起乃以西学为背景。^①

当时倡导国学者大有留学西方之仁人志士。清华国学研究院对于导师提出的三点要求是：第一，通晓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第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治学方法；第三，稔熟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这最后一条就是要求导师熟悉西方的中国研究成果。

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汉学”（Sinology）。可见上个世纪国学的兴起除了有西学的背景，还曾受到海外汉学的激励。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都是对于欧美日本的汉学研究有相当了解的学术大师，都认为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兴者，鼓吹中西学术共存共荣。

其实，王、陈的中西共兴论隐含一个前提，那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吾国之旧籍互相释证。”换句话说就是用西方的概念演绎中国的故事，此话虽然刺耳，确是历史事实。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阶段，经史子集的传统考据之学、记诵之学、辞章之学，让位于西方文史哲的学科体系，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理论，在在以西人的治学路径为主臬。中国学术的近代化其实与西学东渐同步发展。而国人治国学，接触和援引西学的最近渠道就是西人的中国研究，亦即汉学。可见，汉学乃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西方研究中国的成果

^① 但是，仍然是强调国学之本位，如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开学致辞中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清华周刊》，第350期）

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研究趣味，西方的话语霸权笼罩着中国学术的天空。毫无疑问，西方“汉学”曾经反哺中国的“国学”。这样，对于域外汉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异国情调的欣赏，也不仅仅是扩大学术视野的纯粹学术讨论，而是洞彻了解近代中西文明对话的一种最佳途辙。质言之，研究域外汉学，不仅要通该国之语言与文化，还要熟悉本国之语言与文化；不仅要通西学，还要通国学，只有在通晓西学和国学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汉学研究之堂奥，寻幽览胜，探骊得珠。

也许是因为语言上的限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的汉学知之不多，相关的研究著作也少得可怜。现在阎国栋教授推出这部煌煌六十万言的《俄国汉学史》，足以弥补此一领域的重大缺陷。

关于俄罗斯汉学的独特品质，国栋教授有很好的把握。他认为，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欧美为主）汉学、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日韩为主）汉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了世界汉学的基本格局。这个分疏是很有见地的。

俄罗斯汉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过程，在17世纪以前，俄罗斯虽然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但并不接壤。因此，北方俄罗斯关于中国的直接报道，并不早于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国南部的记录。即使17世纪俄罗斯派出了自己的使团，也还是在西欧人之后。可见，早期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占有先机，使团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介绍性知识也谈不上学术研究，只能算早期汉学或者前汉学。

但是，俄罗斯毕竟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离不开地理位置上的这个特点，俄罗斯汉学也打上了这样的兼祧欧亚的烙印。彼得大帝（1672-1725）及其后继者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时期的西化改革，正值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欧文化交流的蜜月时期。在彼得堡仿效欧洲建立的皇家

科学院中，就有像巴耶尔（Bayer，1694—1738）这样的德国汉学家在那里工作。在欧洲刮起的中国风，同样吹拂着俄罗斯大地。因此，18世纪的俄罗斯汉学，深受西欧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是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时期，也就是俄罗斯汉学独立发展时期。形成民族特色的俄国汉学到19世纪反身融入国际学术界，从而进入了所谓近代化时期。

由此可见，俄国汉学相对于东亚和西欧北美的汉学而言，有其独特的品味，因为它受到东西方多重文化的叠加影响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因为疆域的邻接，俄罗斯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就成绩斐然且别具一格。由此也生发出研究俄罗斯汉学的独特意义和独特困难。

国栋教授浸润俄国汉学多年，虽然是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出身，却酷爱中国传统经史之学。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精益求精，颇历寒暑。本书不仅以作者所搜集的第一手文献极其丰富而为包括俄罗斯当代汉学家在内的各方专家所称道，而且也以其对于俄罗斯汉学分期和总体把握的宏观架构而成一家之言，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填补国内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空白，而且将刺激我国域外汉学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栋教授还有一系列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的计划，我和广大读者一道期待他今后为学术界贡献更多的优秀成果。

是为序。

2006年11月5日序于京西荷清苑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17 世纪——俄国汉学诞生前的中俄交往	(19)
第一节 中俄初识	(20)
第二节 俄国使团来华与中国信息积累	(22)
一、彼特林使团	(23)
二、巴伊科夫使团	(27)
三、戈杜诺夫	(30)
四、斯帕法里使团	(32)
五、义杰斯使团	(37)
第三节 穿越茫茫戈壁，领略华夏神奇	(40)
第二章 18 世纪——俄国汉学之肇始	(47)
第一节 俄罗斯馆	(47)
第二节 欧洲汉学之引进	(55)
一、拜耶尔	(55)
二、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 之交流	(68)
三、欧洲汉学著作之译介	(75)

第三节 俄国“中国风”	(83)
一、风自西来: 欧洲“中国风”	(83)
二、风自东来: 中俄贸易	(84)
三、风自上来: 俄国宫廷	(87)
四、直观印象: 中国使团	(90)
第四节 俄国早期汉学家	(94)
一、罗索欣	(94)
二、列昂季耶夫	(105)
三、阿加福诺夫	(124)
四、安·弗拉德金	(126)
五、利波夫措夫	(127)
六、格里鲍夫斯基	(133)
第五节 满汉语教学	(136)
一、外务院满汉语班	(137)
二、皇家科学院满汉语班	(145)
第六节 汉籍收藏	(147)
一、皇家科学院图书馆	(147)
二、最早的中国图书搜集者	(152)
第七节 跨越语言障碍, 翻译满汉经典	(164)
第三章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之成熟	(174)
第一节 著名汉学家	(174)
一、比丘林	(174)
二、西维洛夫	(217)
三、卡缅斯基	(222)
四、列昂季耶夫斯基	(231)
第二节 汉学教育	(244)
一、恰克图华文馆	(244)

二、喀山大学	(250)
第三节 汉籍收藏	(265)
一、亚洲博物馆	(266)
二、喀山大学	(270)
三、外交部亚洲司	(274)
四、俄罗斯馆中外书房	(276)
五、皇家公共图书馆	(279)
六、伊尔库茨克与恰克图	(283)
第四节 确立学科地位, 位列汉学大国	(286)
第四章 19 世纪下半期到十月革命前	
——俄国汉学之发展	(296)
第一节 学院派汉学家	(296)
一、王西里	(297)
二、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343)
三、伊万诺夫斯基	(363)
四、鲁达科夫	(372)
五、彼·施密特	(376)
六、屈纳	(379)
第二节 传教士汉学家	(382)
一、巴拉第	(382)
二、阿列克些	(413)
三、尼阔赖	(422)
四、译经教士	(425)
第三节 亦官亦学之汉学家	(442)
一、杂哈劳	(443)
二、孔气	(450)
三、孟第	(459)

四、柏百福	(461)
五、贝勒	(472)
六、伊凤阁	(476)
第四节 俄侨汉学家	(484)
一、钢和泰	(485)
二、卜郎特	(487)
三、希奥宁	(493)
四、巴拉诺夫	(495)
五、什库尔金	(499)
第五节 汉学教育	(501)
一、圣彼得堡大学	(502)
二、海参崴东方学院	(531)
第六节 汉籍收藏	(542)
一、亚洲博物馆	(543)
二、圣彼得堡大学	(545)
三、皇家公共图书馆	(546)
四、鲁勉采夫博物馆	(548)
五、俄罗斯馆中外书房	(552)
六、伊尔库茨克与海参崴	(554)
第七节 发展中自成一派, 困境中顺应时代	(557)
第五章 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	(572)
第一节 满学	(572)
一、18 世纪	(573)
二、19 世纪上半期	(575)
三、19 世纪下半期—20 世纪初	(578)
第二节 蒙古学	(584)
一、17—18 世纪	(585)

二、19 世纪上半期	(588)
三、19 世纪下半期—20 世纪初	(597)
第三节 藏学	(607)
一、18 世纪	(608)
二、19 世纪上半期	(610)
三、19 世纪下半期—20 世纪初	(614)
第四节 敦煌学与西夏学	(625)
一、敦煌学	(625)
二、西夏学	(631)
第五节 中国边疆民族文献收藏	(635)
一、满文文献	(636)
二、蒙文文献	(644)
三、藏文文献	(649)
第六节 满蒙藏学成就斐然， 敦煌西夏学再辟新域	(651)
结语 俄国汉学的分期与特色	(661)
一、历史分期	(662)
二、主要特点	(670)
三、与世界汉学的关系	(674)
四、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680)
附录	(686)
一、主要参考文献	(686)
二、人名索引	(705)
后记	(729)

引 言

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汉学共同构成当今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今我国对西方汉学以及东亚汉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范围迅速扩展、研究角度不断求新，研究深度逐步加强。与此相比，对俄罗斯汉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开展晚，而且研究成果寥寥。随便翻开一部中外文化关系史论著，关于俄罗斯汉学不是付之阙如，就是蜻蜓点水。显然，这种状况不仅不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与俄罗斯的汉学成就不相匹配。中俄两国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历史上官方及民间的交流密切而频繁。俄罗斯汉学自18世纪始，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学者辈出，著作充栋。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汉学研究规模之大，研究人员之多，研究力量之强，世界罕见。帝俄时期的汉学家有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1717—1761）、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1716—1786）、利波夫措夫（С. В. Липовцов，1770—1841）^①、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1777—1853）^②、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1798—1871）、卡缅斯基（П. И. Каменский，

① 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四贴班”。本书中俄国汉学家汉名或中国史籍中的翻译形式参考了蔡鸿生先生的《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下从略。

② 比丘林在其1810年于北京刊印的《天神会课》一书中自译其名为“乙阿钦特”。参见 Вахтин Б. Б., Гуревич И. С., Кроть Ю. Л., Стулова Э. С., Торопов А. А.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Вып. 2 М., 1973. С. 426.

1765—1845)、列昂季耶夫斯基 (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1799—1874)、王西里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①、巴拉第 (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②、杂哈劳 (И. И. Захаров, 1814—1885)^③、孔气 (К. А. Скачков, 1821—1883)^④、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⑤、伊万诺夫斯基 (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 1863—1903)、孟第 (Д. А. Пешуров, 1833—1913)^⑥、柏百福 (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⑦、贝勒 (Э. В. Бретшнейдер, 1833—1901)^⑧、伊凤阁 (А. И. Иванов, 1878—1937)^⑨和屈纳 (Н. В. Кюнер, 1877—1955) 等, 他们都是俄国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而比丘林、巴拉第和王西里更被誉为是帝俄汉学的三巨头^⑩, 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广泛声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引用过俄国汉学家的著作, 从而使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出现了 5 位汉学院士: 阿理克 (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⑪、康拉德 (Н. И. Конрад, 1891—1970)^⑫、齐赫文

① 汉语音译为“瓦西里耶夫”, 中国史籍中称之为“王西里”、“瓦习礼”或“王书生”。

② 汉语音译为“卡法罗夫”, 中国史籍中多称之为“巴拉第”, 也称“巴第”、“鲍乃迪”。

③ 汉语音译为“杂哈罗夫”, 中国史籍中称之为“杂哈劳”。

④ 汉语音译为“康·斯卡奇科夫”, 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孔气”或“孔琪庭”。

⑤ 中国史籍中称之为“格倭尔儿耶甫司克”。

⑥ 汉语音译为“佩休罗夫”, 汉名为“孟第”, 中国史籍中亦称之为“丕业什楚罗福”。

⑦ 汉语音译为“巴·斯·波波夫”, 汉名为“柏百福”, 笔名“茂林”。

⑧ 汉语音译为“布列特什内德尔”, 又译为“白莱脱骨乃宴”、“布莱资奈德”、“贝勒士奈德”等。

⑨ 汉语音译为“伊万诺夫”, 汉名为“伊凤阁”。

⑩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2. С. 57.

⑪ 汉语音译为“阿列克谢耶夫”, 汉名为“阿理克”, 又称“阿翰林”。

⑫ 本为日本学院士, 同时在汉学领域也做出很多成就, 曾翻译《孙子》, 出版有《汉学》等著作。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米亚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1931—)、季塔连科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 4 位通讯院士: 费德林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斯拉德科夫斯基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1906—1985)、宋采夫 (В. М. Солнцев, 1928—2000) 与李福清 (Б. Л. Рифтин, 1932—), 此外还有大批汉学家在各自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汉学著述不仅凝结着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文化氛围中的存在状态。我们只有对俄罗斯汉学进行扎实的研究, 才有可能领略俄罗斯学者运用本国人文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解读, 回应他们的观点, 促成学术交流的健康态势形成, 同时促进许多相关学科, 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的开展, 推动中俄关系研究的全面发展。

中俄两国间的文化联系长期被学术界忽视有其历史渊源。自 19 世纪下半期以来, 俄国侵占我国领土一直是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 如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民国时期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的《沙俄侵华史》等。解放以后, 有关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在我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如戈宝权的《谈中俄文字之交》、陈建华所著《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以及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等。而对于中国文化在俄国的流播和影响, 则少有人涉足。

回顾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 走过了一条短暂却不平凡的道路。从研究规模、研究成果和对于这种学问的认识变化上看, 我们似乎可以将 20 世纪 90 年代看作一个分水岭, 将这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 也可以说是准备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是另外一个阶段, 或曰振兴阶段。

中国学术界与苏联汉学界的学术交流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

已经开始。特别是在汉语语言学领域，中国学者积极借鉴和引进苏联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对中国的汉语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和萧三等人 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1900—1955）、郭质生（В. С. Колоколов，1896—1979）合作，致力于汉字拉丁化的可能性研究。而后，龙果夫、谢·雅洪托夫（С. Е. Яхонтов，1926—）、鄂山荫（И. М. Опанин，1900—1982）、鲁勉斋（М. К. Румянцев，1922—）和郭俊儒（В. И. Горелов，1911—1991）的汉语语言学著作不断在中国被翻译发表。特别是龙果夫的汉语研究论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①1957年王力先生发表文章，号召学习苏联汉学家的汉语语言学研究成果。^②与此同时，苏联汉学家也积极回应中国语言学家的学术观点。^③

我国最早对俄国汉学史进行研究的是莫东寅先生。他于1949年出版了《汉学发达史》一书，对欧美汉学进行了回顾和研究。在第6章中，作者介绍了法、英、德、荷、美、俄等国的主要汉学家及著作。在俄国部分，莫东寅概述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比丘林、杂哈劳、巴拉第、贝勒、奥·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1—1878）、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О.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1793—1850）、王西里、伊万诺夫斯基、伊凤阁和阿理克等10余位汉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汉学成就，同时还

① [苏] 龙果夫著，唐虞译：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1931年（此文的另一译本《灰韵之古读及其相关诸问题》由蒂若译，载《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2期）；古藏语的浊塞音和塞擦音（英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6年。

② 王力：关于暂拟的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问题——并谈语法工作中向苏联学习的意义，《语文学习》，1957年第11期。

③ [苏] 穆德洛夫：汉语是有词类分别的（对高名凯教授的文章提一些意见），《中国语文》，1954年第29期。

介绍了伊·施密特（И. Я. Шмидт, 1779—1847）、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 1741—1811）、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巴尔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 1869—1930）、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 1835—1920）、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 1863—1935）、拉德洛夫（Ф. В. Радлов, 1837—1918）和弗拉基米尔措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等东方学家对中国蒙古、满洲、新疆、西藏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研究情况。莫文虽然篇幅不大，但叙述简洁，史实陈述准确，大致勾勒出了俄国汉学的发展脉络。从莫书后所列参考书目判断，俄国部分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巴尔托尔德所撰之《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其他国家则主要参考了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因为石田先生虽然在绪论中称主要参考了“英之尤耳（Yule）、德之李訖风（Richthofen）、俄之巴托持（Bartold）^①诸硕学所述”^②，但实际上对俄国汉学史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只是在介绍曾经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工作的拜耶尔（Theophilus Sigfried Bayer, 1694—1738）和柯恒儒（J. Klaproth, 1783—1835）时有所涉及。

自莫东寅先生之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直到20世纪70—80年代，孙越生先生开始从事国际汉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立志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③孙先生以他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主要力量，编辑出版了一份不定期的辑刊——《外国研究中国》。此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78年出版第1辑，到1980年5月，共出版了4辑。其中刊登了少量有关俄罗斯汉学的文章，

① 即巴尔托尔德。但这里不是指巴氏之《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而是1913年在莱比锡用德文出版的《东方历史上及地理上的探讨——以俄罗斯为中心》——笔者注。

② [日] 石田干之助著，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平中法大学，1934年，第1页。

③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